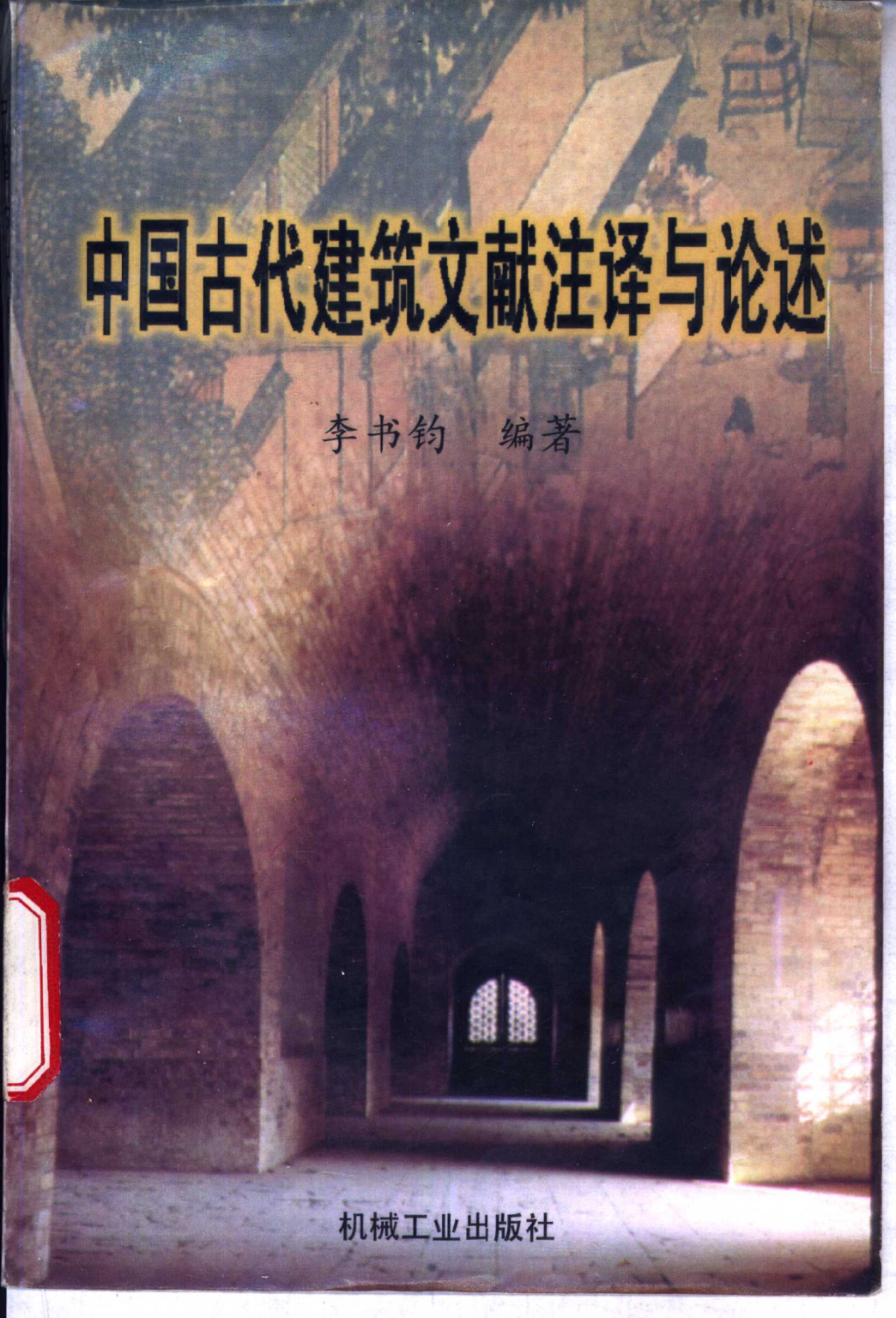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注译与论述

李书钧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注译与论述

李书钧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以时代顺序为线索,从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筛选出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建筑内容的文献编撰而成,对所选文献均加校勘、分段、标点、注释,并将文字难度较大的先秦部分译成现代汉语;此外对内容也适当进行分析,以便于读者能顺利阅读,进而可有助于探讨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发展规律。

本书内容具有知识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特点,可供大专院校土木、建筑等专业学生学习,也可供上述专业的教师以及古建筑设计、施工、研究工作者参考。此外,对于爱好古建筑的朋友,它也是一本饶有兴味的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注译与论述/李书钧编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10

ISBN 7-111-05378-1

I. 中… I. 李… II. 古建筑-中国-文献-注译 N. 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2221号

出版人:马九荣(北京市百万庄南街1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范兴国 版式设计:李松山 责任校对:肖新民

三河市永和印刷有限公司·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年10月第1版·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12.625印张·339千字

0 001—3 000册

定价:20.00元

目 录

先秦	1	24 秦始皇大兴土	
1 殷墟	1	木	119
2 匠人	6	25 阿房宫赋	128
3 作雒	23	26 秦始皇治陵	135
4 公刘	33	27 秦长城	139
5 绵	41	两汉	143
6 文王有声	47	28 汉长安故城	143
7 灵台	52	29 未央宫	148
8 斯干	55	30 汉上林苑和昆明	
9 鸿雁	60	池	155
10 七月	63	31 前汉诸帝寿陵	160
11 共叔段食京	71	32 袁广汉园亭之	
12 赵文子为室	74	侈	166
13 令尹芳艾猎城沂	77	33 论守边备塞疏	169
14 立国	79	34 赵佗因冈作台	
15 山节藻梲	82	因山为坟	172
16 三十幅共一轂	85	35 新莽九庙	178
17 堆之必柱	88	36 东汉雒阳宫苑	185
18 阖闾城	91	37 梁冀大起第舍	194
19 齐都临淄	96	38 白马寺	198
20 定之方中	104	魏晋南北朝	203
21 楚宫室	107	39 魏宫阙	203
22 儒有一亩之宫	112	40 建业	211
23 都江堰	114	41 统万城	218

42	北魏洛阳城	226	56	万岁山艮岳	315
43	永宁寺	233	57	湖园	321
44	张伦宅	243	58	隆兴寺	325
45	北魏云冈 龙门 石窟	246	59	晋祠	331
隋唐	252	60	喻皓《木经》	335	
46	宇文恺	252	61	杭州	338
47	石桥铭序	259	62	佛宫寺	345
48	唐长安外郭城	264	63	卢沟桥	349
49	大明宫	270	64	元大都	355
50	骊山汤	276	65	宫阙制度	361
51	昭陵图说	284	66	圣旨特建释迦舍利 灵通之塔碑文	372
52	大慈恩寺浮图	290	明清	379	
53	开凿大庾岭路 序	295	67	京师	379
宋辽金元	302	68	砖	385	
54	东京外城	302	69	避暑山庄 外 八庙	390
55	东京大内	307	后记	399	

先 秦

1 殷 墟

(《竹书纪年》)

《殷墟》节自古本《竹书纪年》。文题为编写者所加。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无名氏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却不传于世。直到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有人盗发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在位)，或安厘(xī)王(前276~前243年在位)陵墓，才使它得以重见天日。这部用战国古文撰写的竹简，经当时有名的学者束皙(xī)、荀勖(xù)等人的整理研究，并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定成书，计75篇。其中有12篇是记述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的晋、战国时的魏，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的历史的。由于它出土于当时的汲郡(今河南汲县、获嘉等地)古墓，又因为它是用战国所谓的蝌蚪文写成，故被称为《汲冢纪年》或《古文纪年》等。到北魏时酈道元注《水经》，引用此书纪年，称其为《竹书纪年》，此名为后人认可，就成为较通用的书名了。《竹书纪年》文字虽很简约，但意义和影响却很重大。因为它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历史的内容，且纠正了一些包括《史记》在内的传统史书的失实之处。后世一些学者如郭璞、干宝、酈道元、司马贞、李善、顾炎武等，都曾在他们的著述中征引这部书来说明历史问题。也许正因为它和一些传统史书某些记载有悖，也就为一些保守的正统儒家学者所不容。唐代以后，

此书逐渐散失，南宋后几已全部亡佚。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有人假托南北朝时梁国沈约注释的两卷本《竹书纪年》问世，这就是现在称之为“今本”的《竹书纪年》。这部书尽管是明人伪作，但在400多年前，存世的原本佚文，当多于近代和现代。因此，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也有所本，未便全部予以抹掉。这部书到清代朴学抬头，考据之风盛行后，才有钱大昕、郝懿行等人，力辨其伪，朱佑曾更从一些古籍中钩沉，辑录《竹书纪年》佚文，编成《汲冢纪年存真》一书，内容自然更加可信，这就是现在称为“古本”的《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载有殷商时期，殷王盘庚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建立国都——殷一事。殷，后人称其为殷墟，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被证实并大体弄清楚了了的国都。按在我国古代史上，自成汤灭夏，建立殷商王朝以来，国都屡迁，直到公元前14世纪，成汤的第19代传人殷王盘庚把国都由奄（今山东省曲阜一带）迁殷以后，才完全固定下来。在这以后历经八代12王的273年中，到周武王伐纣，殷被毁弃为止，它一直是这个奴隶制得到空前发展国家的首都。也许正因为它定都的时间这样悠久，加上当时以青铜制成的生产工具、精美的青铜礼器、生活用品、建筑构件等在王室贵族中被普遍采用；另外便于总结记事的甲骨文的日臻成熟，特别是自盘庚以后的11代殷王，除武丁、祖甲外，几乎都是一些淫逸享乐之徒，其中尤以末代殷王纣为甚。因此宫室殿堂和陵墓都建造得十分恢宏而壮丽。例如《说苑》引《墨子》就说：“宫墙文画，雕琢镂刻，锦绣被堂”。古本《竹书纪年》也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又说：“纣时作琼宫，立玉门。”这些记述，容有夸张之处，但从近年由殷墟故址考古发掘出的精美贵重的器皿和建

筑构件，以及规模庞大的陵墓来看，可能并非全是子虚乌有。

这座已消失 3000 多年的殷商故都——殷墟，由于一个偶然因素而被发掘出来了。那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有人从被当作中药所谓的龙骨上，辨识出了甲骨文，继之又有人从这些甲骨文中审识出《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殷王名谥 10 多人，进而确定了这些甲骨文出土处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就是曾在这里建都近 300 年之久的殷墟。根据这个线索，我国考古工作者，从 1928 年起，在这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科学发掘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括地志》和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所载的殷墟地望，而且还大体弄清楚了关于殷墟的范围、面积、建筑物的分布特点等。

今天已探明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约二公里处的殷墟故址，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长约六公里，南北宽约 10 公里，总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建筑分布情况是：小屯村东北部为宫殿、宗庙和贵族居住区。在它周围未发现城垣，但在它西南约 200 米处，却发现一条长约 750 米，宽约 7~21 米迤邐东北去的壕沟。有人分析，这可能如城垣一样，为宫殿、宗庙区的防卫设施。目前已在这个区域内发掘出建筑基址 50 多处，其平面形制不一，有方形、长方形、凹形、圆墩形等。主要宫殿多东西向，和后世一般一律南向者不同。其中最大的一处南北长 85 米，东西宽 14.5 米。大型台基上有直线行列的暗柱础，由大块天然卵石构成，有的上覆以盘状铜簠。屋面据《考工记·匠人》：“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再从近年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及盘龙早商宫殿遗址擎檐柱与檐柱距离研究中所得结论，证明它亦应为重檐庑殿顶。因为在发掘中一直未发现瓦，因此当全为茅茨覆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曾在—堵

残墙上,发现了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组成对称图案的墙皮,这在墙壁上施彩绘的建筑装饰,比秦时咸阳宫中的壁画,要早出 800 多年。从以上建筑基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殷墟宫室的布局已开始“用单体建筑,沿着与子午线大体一致的纵轴线,有主有从地组合为较大的建筑群”(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31 页)。这实际上已是具有后世宫室制度前殿后寝和纵深对称布局的雏形了。这种布局追根溯源,应是在一定礼制条件制约下的产物。关于殷代礼制,从备受孔子称颂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正是“因于殷礼”,是从殷礼的继承与发展中形成的。因此,尽管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今天还不很清楚更多的殷礼的具体内容,但根据近年一些学者的探讨研究,殷商时期已出现宗法制度,因而其礼制核心也应是以血缘关系来定尊卑、贵贱与主从的等级观念,以及天无二日、唯王独尊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它同周礼应是并无二致的。关于陵墓,在洹水北岸侯家庄、武官村一带为王陵区,和小屯村的宗庙、宫殿区隔河相望。那里分布着 10 余座排列有序的大墓。其中一座的平面是有四条墓道的“亞”(简体作“亚”)字形。墓室和墓道的总面积达 713 平方米,内有巨大椁室,装饰十分华贵。已发掘的大墓,都发现众多的人殉和人祭,多者数百具。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残暴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可见一斑。

今天据可靠的文献记载和科学的考古发掘,我们虽然大体清楚了我国建筑史上第一个被证实、被公认了的国都——殷墟的概貌。但毕竟还有一些有关重要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诸如它的城制和防卫设施,以及宗庙、宫室、街衢、民居等的整体规划究竟如何?仍需要人们从考古、文献、建筑科学等领域继续努力探求。

【原文】

盘庚旬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①。

殷在邠南三十里②。

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③。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④。

帝辛受居殷⑤。

作琼室，立玉门⑥。

据《汲冢纪年存真》(归砚斋藏版)，引文出处略。

【注释】

① 盘庚：成汤后第19代殷王。《史记·殷本纪》说：“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盘庚即位后，鉴于王室贵族的生活日益修糜腐化，奴隶、平民同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决定将国都由奄迁到黄河以北的殷。为了表明他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还为比发布文告。《尚书·盘庚》即专门记述了此事。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使王室统治得到巩固，奴隶制度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旬：今本《竹书纪年·注》说：“盘庚，名旬”。并引《史记·殷本纪》正义说：“盘庚，字也”。但《水经注·洹水》和《太平御览·八十三》所引《竹书纪年》均无此字。奄：地名。殷商立国后国都屡迁，仅从仲丁到盘庚，就迁都五次。第四次迁都是南庚由邢(今河南省温县东)迁到奄(今山东省曲阜县一带)。北蒙：地名，亦作“北冢”。《史记·殷本纪·索引》说：“殷墟南旧地名北冢也”。实即殷墟。

② 邠：地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③ 纣(zhòu)：殷商王朝最后一个国君，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名“辛”：纣，是他死后加给他的恶谥。由于他荒淫暴虐，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终于为周武王姬发攻灭，殷亡。

④ 朝(zhāo)歌：帝乙、帝辛纣时的别都，位于今河南省淇县东北。邯鄲：城邑名，位于今河北省南部。战国时为赵都，秦时置邯鄲郡，隋以后置邯鄲县。新中国建立后，于1952年设邯鄲市。沙丘：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内。《史记·殷本纪》载：“帝纣……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此句“纣时”以下23字，王国维认为是张守节在《史记·殷本纪·正义》中释《史记》语，而非《竹书

纪年》本文。

⑤ 受：帝辛纣的别名。《尚书·立政》说：“其在受德馨(mín)”。《吕氏春秋·当务》据以谓纣名“受德”，误。

⑥ 琼室：用美玉装饰的宫室；琼，美玉。玉门：当为用玉石镶嵌的门扇、门楣等。据载籍、甲骨文和考古发掘，说明殷王室拥有大量的玉、玉器和玉工、治玉的工具和工场等。因此用于建筑上的“琼室”和“玉门”，当有所本，并非虚构。

【今译】

盘庚(旬)登位后，(把国都)从奄迁到北蒙，(取名)叫殷。

殷位于邶城以南 30 里的地方。

从盘庚迁都到殷，到纣时(殷商王朝)被(周武王)攻灭，273 年之间再也没有迁过都。纣王(在位)时逐渐扩大这个都邑的范围，南面到朝歌，北面达邯鄲和沙丘，都建有(他的)离宫别馆。

帝辛受(登位后仍然)住在殷。

(他曾)建造以琼瑶装饰的宫室，安装用美玉镶嵌的宫门。

2 匠 人

(《考工记》)

崛起于渭河流域中下游的周族，经过长期的奋斗发展，到周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时，国力雄厚，已成为完全可以同殷王朝抗衡的强大方国。公元前 1045 年^①周武王终于联合庸、羌、蜀等八个南方小国兴兵伐纣，只经过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摧枯拉朽，一举攻入朝歌，纣王自焚，殷亡。

周王朝建立后，版图已由最初的西北一隅，扩展到黄河、

① 赵光贤：《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文史知识》，1990. 8 期

长江、淮河、济水等流域，疆土广袤，已非昔日的殷王朝可比。但殷虽亡，殷人的潜力尚在，殷的一些与国如徐、奄、薄姑等，也都具有一定实力，这自然使新建的周王朝的统治者不能丝毫掉以轻心，周武王甚至为此忧心忡忡“自夜不寐”。此外，特别是克殷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年幼的成王姬诵继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居摄，代行国政。此事竟然引起被封于殷都旧地代行统治殷人的纣王儿子武庚、和实际监视武庚的武王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所谓的“三监”，以及上述东夷族的徐、奄等方国联合起来，起兵反周。这次反叛的战火，最后虽被周公统率的东征大军，用了三年时间予以扑灭，但这个教训对周公来说，却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怎样巩固周王朝的政权，使之长治久安，无疑是当务之急。于是在他的领导下，陆续制订出一系列重大的谋略和决策。正如《尚书大传》所说：“周公执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这就告诉人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周公除了进一步推行武王在世时即已开始了的“封藩建卫”和遵守武王遗志，营建成周雒邑外，还更为长远地考虑、制订出一系列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则和规定。这就是所谓“制礼作乐”中“周礼”的出台。

根据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的说法，周礼是在殷礼的基础上，有损有益，有舍弃，也有继承和发展的情况下，使之成为奴隶社会中一种十分系统、非常完备的礼仪制度。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和贵族等级制度涵盖下，严格执行分君臣、定亲疏、明尊卑、别贵贱，使人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社会位置，并遵守人际关系中合乎礼仪的是非界限，从而为维护君王的最高权威和稳定社会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这种治国安邦的大计，除了设官分职和体国经野的重大政治措施外，更为普遍的还是通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

的种种规定和制约来实现的。正如《荀子·王制》中所说的那样：“衣服有别，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

“宫室有度”，就是把奴隶社会中包括王城、宫城、都邑在内的建筑规划，一一纳入礼制轨道，使它们不仅仅是为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有其实用性，而且同时还要体现天子地位的至高无上和各级贵族爵位的等级差别，有其典礼的制约性。这样就形成了奴隶社会中城邦建设规划的一整套固定模式。例如天子所居的王城要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宫城要居玉城正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中轴线南北贯通；王城以外的诸侯城、都城要按等级爵位决定面积大小。制度分明，不容混淆，如有逾越，就是僭越违礼。

当然，这种礼制建筑规划，毕竟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它的进程也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春秋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称王，战争频仍，西周时期那种王城建筑的礼制模式，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而不为各国诸侯、君主所信奉。据今天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勘测研究，在这长达 500 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除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鲁的曲阜以外，其它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和燕都下都等都城，在规划中的平面布局 and 空间结构上都自行其是而各有千秋。秦始皇灭六国、并天下后，不搞分封而行郡县制，宗法观念相对淡薄，因而作为统一了的大帝国国都的咸阳，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布局上更是别出心裁。汉魏之交成书的《三辅黄图》就曾这样为它画图说：“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试看，这同西周时的王城规划，能有多少相同之处。无怪东汉的班固在他的《西都赋》中对这两种不同的建筑体制和风格，干脆分别称其为“周法”和“秦制”。但出人意外的是：封建

社会进入成熟时期，从汉代以后，都城规划的蓝图，并没有按“秦制”去画，相反却沿着“周法”的道路走下去。秦灭，咸阳被毁，萧何、阳成延和汉惠帝刘盈先后筑未央宫和长安城。其规划尽管班固说它是“跨周法，揽秦制”，但看看筑成的长安城，那种平面大体呈方形，四面各有城门三座的结构布局，可知受西周王城礼制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如果把西汉长安城作为从“秦制”到“周法”的一个过渡，那么，从东汉雒阳开始，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为止，前后两千多年中，这种西周式的礼制建筑体制在历代王朝的都城规划中，都基本被奉为圭臬。为什么诞生于奴隶社会，适合奴隶主需要的礼治建筑，会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长期受到封建帝王的垂青而大走宏运呢？这是由于：

一、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却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以后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竭力为周礼辩护。孔子终生以维护周礼为己任，他无限向往地大声疾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并以正名为手段，企图恢复周礼在社会生活中的老样子。荀子是儒家的革新派，但在新的意义上，他也主张礼治。在《荀子·礼论》中，他强调：“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如果说孔子和荀子的礼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那么到了西汉，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接受了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礼治思想，包括礼制建筑在内，就不仅在思想、学术领域，就是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也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指导地位。

二、在奴隶社会中诞生、完全符合奴隶主利益的周礼，在

① 《论语·八佾》。

封建社会的某些方面也完全符合封建皇帝的利益而受到保护和推崇。例如公元前 202 年，汉王刘邦即帝位，在一次庆功的宴会上，一帮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功臣武将“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可谓狂妄之极。刘邦对此虽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这时圆通老练的儒生叔孙通出而为他献策“起朝仪”。得到刘邦的首肯后，叔孙通就指导群臣习礼，经过一年多的演练，到公元前 200 年，诸侯群臣在这年岁首，于刚刚修葺改造完成的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贺仪式时，就完全按照叔孙通设计的方案行事：功臣列侯，文武官员按爵位职务依次排列，根据周礼九仪，待皇帝乘辇出，才由谒者依次引进奉贺，以尊卑次起上寿。这时这些朝贺者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这位“高皇帝”不禁暗自赞叹周礼的神效，乐不可支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朝仪如此，同样以周礼为指导思想的都城建筑规划也是如此。

汉兴，如欲按周礼体制兴建都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苦于西周时的丰、镐和雒邑业已荒废湮没，现成的样板是没有的。其次，要借助于有关文献，当时困难亦多。因秦始皇三十四年曾从丞相李斯议，下焚书令，规定“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②看来烧得是够彻底的。但是，从上述引文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被烧的都是民间藏书，为秦廷所有、“博士官所职”者则不在被烧之列，而这些幸存下来的诗、书、百家语，到公元前 206 年刘邦率军首先攻入

① 参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咸阳时，为独具慧眼，“为丞督事”的萧何所收藏。这些图书档案，在以后争夺天下的斗争中，曾为刘邦帮了大忙，使他较快地战胜项羽，扫平群雄，登上皇帝的宝座。11年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开始筑长安城，这时萧何尚在世。经过三次大规模地兴工修建，到惠帝五年（前190年），筑城工程竣工。这座都城在先已建有庞大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并受渭水流向制约的不利自然条件下，能把它设计成平面大体作方形，四面各开城门三座，每座城门各有一条或长或短的大街通往城内以相经纬。明显地可以看它具有西周王城建筑规划的一些影子。设计者如果没有掌握有关的先秦图书资料，恐怕是很少有这种可能的。因此，自然使我们想起在战国时即已在七国广为流传、载有西周王城规划的古文本《考工记》。它极有可能就是萧何收藏的原秦廷保存的“诗、书、百家语”中的一种。

《考工记》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书呢？

《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的一部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作者不详，成书时间，古今的研究者意见也不一致。当前一般认为它应是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时，齐国用以考核、监督百工生产的一部官书。《考工记》也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这是因为大约东周时无名氏写的《周官》一书。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中的冬官司空部分逐渐失传。西汉景帝刘启时，“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刘德因购求千金不得，就把类似的《考工记》补入，一并献给朝廷，但却没有引起重视，一直藏入皇家秘府，被冷落了100多年。到西汉末年，博览群书的刘歆奉诏校书时，才从秘府中把它翻了出来，献给正搞托古改制、一心篡夺汉家皇位的王莽，这部书当然正适合他的政治需要，因此，不仅被立于博士，并且还把《周官》改为《周礼》，列入经学行列，身价自然倍增。但好景不长，篡权得手的王莽所建

的新朝很快覆灭，这部被奉为“国典”的《周礼》也随同被废掉了。但尽管如此，却未能阻止一些儒生私下对它的学习。等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出而为其作注，列为《三礼》之一；唐代孔颖达进一步为其作疏，并刻入《开成石经》列入《十三经》后，才无可争议处于十分崇高的地位，为以后历代帝王和士大夫所尊崇。

《考工记》自宋代以后，逐渐脱离《周礼》，单独解析、研究的著述渐多，如宋代林希逸的《考工记解》、明代徐光启的《考工记解》、清代戴震的《考工记图》、方苞的《考工记析疑》、金鄂的《天子城方九里考》和戴震的《匠人沟洫之法考》等陆续问世，说明它的科学价值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开始实事求是地做多方面的探索，这自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考工记》的内容分“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和“抔埴之工”六大部分。包括车舆、土木、兵器、冶金、制革等 30 个工种（因书有残缺，今天只能看到 25 个工种的具体内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使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一些古器物和各项营建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多种手工业的分工情况、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因而无疑是认识、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一部重要文献。

《匠人》见于《考工记》中的“攻木之工”。它对于西周初期的王城、宫城和道路、农田水利，乃至单体建筑的屋舍、仓库等的体制、规划、施工工艺等，一般都作了具体的记载或描述，从而对后世的营造事业产生很大影响。首先，如前所述，从汉代以后，直到封建社会瓦解，所有的封建王朝，在建都问题上，几乎无不遵循西周王城规划的礼制原则。但反过来，却无任何一个王朝完全按照《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图式来行事，而总是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需要和建都的地理形